

北宋祖无择事迹考述 (一)

陆俊青

北宋熙宁、元丰年间，洛阳有个真率会，参加者均对王安石新政持异议。闻名洛中，号称“九老”，祖无择与司马光、文彦博、富弼等均厕身其间。关于祖无择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的编纂者李焘曾有过这样的说法：“祖无择当立传而史官逸其事，须别考详”^①。笔者在洛阳时，有幸一睹祖无择之墓志铭残碑^②，发现其生卒年与史载不同，遂抄录残碑，翻检史料，略加考索，缀成其事迹考述。此处是对其生卒年、名字和文集名称的辨正及与王安石关系的阐述，期能补史书之不足，有益史学研究。

祖无择，字择之，宋蔡州上蔡（今属河南）人。其生年史书未载。《龙学文集》卷一说：“公卒时元丰八年正月十五日”。未记享年几何。寻祖氏墓铭碑文，则为“公以元丰七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正寝，享年七十有四。”祖无择的墓志铭是范纯仁撰写的，但《范忠宣公文集》未存此稿，《龙学文集》中也不见收。集中所记祖无择卒年盖其曾孙祖行编纂文集时所云，相隔多年，难免不尽精确之处。墓铭系祖无择当代人所撰，可资依据是毋庸置疑的。据碑文，我们可以推知祖无择生卒年为：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（1011年）生，宋神宗元丰七年正月十五日（1084年）死，享年七十四岁。

王德毅博士《宋人传记索引》云：“祖无择，字择之，初名焕斗。”初名云云，是不对的。致误之由，或出《焕斗集》之名。按无择曾学经术于孙复，学文于穆修，此两人当时甚有才名，无择得以熏陶，平生著作甚富，因两经兵火，家藏颇多失散，南渡以后，只剩得十之二三。光宗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，其曾孙袁州军事判官祖行才加整理，哀为十卷。又有名臣贤士往来诗文，为二卷附之。其叔祖岳、祖士衡、弟祖无颇、姪祖德恭等诗文，又作四卷，亦附于后，是为十六卷。因祖无择出知陕府时，欧阳修饯行诗有“西州政事藹风谣，右掖文章焕星斗”之句，乃名之为《焕斗集》。此即：“先生遗文初名焕斗集”^③之由，这或也是王德毅先生致误之源。又因每卷标目别题洛阳九老祖龙学文集，故“诸家书目并称龙学文集”^④。“《永乐大典》、焦氏《经籍志》俱称龙学集而焕斗之名不显”^⑤。可见，《龙学文集》即《焕斗集》，而焕斗并非无择之初名甚明。

史载祖无择“以忤安石废弃终身”^⑥。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祖无择为同修起居注，知制诰^⑦。王安石在此年六月亦为知制诰。当时，词臣作诰命许受润笔物（即古时之稿酬），

①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下称《长编》）卷二七〇。

②墓碑出土时被村民凿为井口，由范纯仁撰文，司马光篆盖，鲜于侁书丹，现存洛阳关林。

③④《宋元学案》卷二。

⑤《龙学文集》卷一。

⑥《宋史》卷三三一。

⑦《东都史略》卷七六，另见《龙学文集并源流始末》。

王安石因辞一家所馈润笔物不受，置物于舍人院梁上，后以母忧去，祖无择以为公用。无择以安石为诘名钓誉，安石则以无择为不廉，由是两人交恶。

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二月，力图“思除历世之弊，务振非常之功”的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筹备变法。五月，以翰林学士、兵部员外郎郑獬为翰林待读学士、户部郎中知杭州，代祖无择。九月，诏御史王子韶体量苗振不法事。闰十一月八日，遣沈衡鞠前知杭州龙图阁学士祖无择于秀州，遣内侍管担无择乘驿骑就对狱。又遣权御史台推官张景直鞠前知明州光禄卿苗振于越州，皆因御史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。张景直以亲嫌辞，命职方员外郎徐九思代之。十二月，知通进、银台司祖无择下秀州狱。熙宁三年七月，前知杭州、龙图阁学士、右谏议大夫祖无择责授检校工部尚书，忠正军节度副使，不签书本州公事。

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记载说：祖无择知杭州，王介甫恶之，监司承风旨，以赃滥闻。遣御史王子韶按治，锻炼无所得，坐遗游客酒三百小瓶，责节度副使安置，士大夫冤之。同时有知明州苗振，监司亦因观室发其赃罪，朝廷遣张横渠先生按治，悉平反之，罪止罚金。其幸不幸有如此。从这段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它包含着邵伯温个人浓厚的感情色彩。伯温的父亲邵雍与司马光、富弼等过从甚密，都是反对王安石熙宁新政的。熙宁二年时，祖无择曾荐邵雍。祖无择与邵雍同是宋范阳（今属河北涿县）人，又都居住洛阳，司马光、祖无择可谓邵伯温的前辈。伯温自幼随侍父侧，耳濡目染是反新政的言行，所以他对祖无择多所回护也是极显然而合乎情理的。

事实上，祖无择也并非“锻炼无所得”，《长编》、《会要》记载祖无择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时，“丁忧人屯田郎中任浩追一任官，勒停，经思未得叙用。国子博士致仕钱羔羊追三任官，衢州编管。殿中丞致仕王景追一任官，勒停。泗州参军张应岩追参军，明州编管。监杭州军资库、司法参军孙辅特冲替。无择坐知杭州日贷官钱及借公使酒，并乘船过制，与部民接坐，及听浩、景、羔羊、应岩等曲法请求。辅坐主公使阿徇无择。法寺奏已，会去年十一月德音，内无择、羔羊、应岩，皆特断，余如法寺所奏”^①。可见，无择确实是做了一些“不法事”。李焘注：旧《纪》书龙图阁学士祖无择坐贷官钱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。新《纪》不书。又可见新《纪》有所讳而旧《纪》不讳。韩驹《南窗杂钞》云：祖无择知杭州，坐法，制勘，郑獬往代。至郡，上疏曰：“臣过秀州，见赤地千里，蝗蝻蔽天，私怪其故。已而私就逮者累累，道路不绝。问之，皆坐无择事追证也。无择官谏议大夫，职龙图阁学士，乃以坐法就逮，臣不为无择惜而为圣朝惜也。按无择与官妓薛希涛通。然闻希涛榜笞至死，事卒无实。至于给致仕官张先酒醋历子及治亭榭不支瓦木价钱，则皆州郡常事。且今参政王安石前知江宁，蔡襄如知福州，皆常缮营矣，岂尽出于家财？”郑獬所上《救祖无择疏》说：“无择所犯大者止以媚人薛希涛及屯田员外郎中任浩等请铸钟事。臣熟究希涛事，皆云无之，证左甚明。就使有此，朝廷不容，不过重削官而已。请托铸钟事，无择亦不知任浩等受贿。其余请射屋地，给卖祠部及酒历，予富民钱出息以助公帑，造介亭等事，此皆前后知杭州者常为之、孙沔时，人请地至多，或连山林，以予之造中和堂，双门号为雄特。梅挚造有美堂，蔡襄造惜佛堂，沈遘率民造南塔。土木之费，岂特一介亭比？卖祠部取赢钱以资寒士，此处处皆然。给酒历至今犹有请者。至于称曾祐受赂至万余缗，臣见转运司榜通衢募人告祐事，卒无告者。惟造书榭不还，十数缗已而”^②。从这些话中，也可见当时社会实情的端倪。（下转第146页）

①《长编》卷二一三，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六五之三三，《鄮溪集续补》页一。

②《鄮溪集续补》页一。

学作品中的语汇和修辞手法的变化。但就总体言，俗文学仍然有其独立的发展。这一发展以说唱艺术或曰曲艺的繁荣为基础。这些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拥有自己的一套观念、典故、成语和表现手段的程式。它们既向民间歌辞吸取音乐手段又在文学素材上互相取资，因而成为唐代文学中的一个大国。

但和作家文学相比较，俗文学作品却是缺少艺术个性的作品。这一方面决定于它的流传形式：它往往是通过口耳来传播的，具有一定的集体创作性质；另一方面，也决定于它所产生的文化基础。它接受包括佛教讲唱在内的其它说唱作品的影响，重视社会效果，强调惩恶劝善，因而往往以人生态度作为作品主题；它服务于市民或村民，为适合他们的思维习惯和审美习惯，往往通过大家熟悉的典故来说明事理；它由粗通文墨的人物创作，它使用比较普遍的社会观念，它迎合人们的习俗和道德，因而常常使用旧的题材和旧的意识。《高兴歌》就是这样。在题材、思想、艺术趣味和艺术风格等方面，它和王梵志诗、《渔父歌沧浪赋》、《龙门赋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孝子传》等等作品有很多相同之处。

通过《高兴歌》，我们可以看到表层文化（士大夫文化）如何积淀成为基层文化（庶民文化）的过程，也可以看到每一阶层的文化成品都拥有特定的社会属性的事实。但要把上述事件说清楚，就还要解决《高兴歌》的作者问题，以及《高兴歌》的思想源流问题。限于篇幅，这些问题拟放在另文中作专门讨论。

（上接第 98 页）

祖无择确实是有不法事，但是当时又有多少官吏不假公济私、贪污受贿呢？其所列罪状看来都凿凿有据，只是这一些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官员的身上，就连王安石也不能免。王安石事后对神宗说：“陛下遣一御史出，即得无择罪，乃知朝廷于事但不为，未为之而无效者^①。”听似专横的奉承话，却恰恰道出了王安石自己的心情和当时官场的实情。

王子韶在熙宁时被目为“十钻”之一^②。其承望安石风旨而发无择不法事是有理由的。一则，王安石是他的后台；二则，子韶妻父沈扶闲居杭州时，谋造宅舍，每每于本州干借捍行役兵，知州祖无择又守法不与^③。这又使子韶与无择存此芥蒂。故王安石使王子韶出按淮浙，可谓得其人矣。“无择未就狱，客寄僧舍，随行惟一仆指使。家又素贫，资用罄竭，常将银唾，壶一只质钱。秀民畏恐，皆不敢留质，日就僧寺假贷数百钱，以供朝夕。或有怜者，为之具馔，狱囚见之，皆为号泣”。^④如是，则不得为贪官也。

熙宁三年王安石专政时，司马光、富弼均坚辞求出。无择也慨然乞分司西京御史台，并作《请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谗而去因以述怀》以明心志：“割断攀缘宰相权，忧危争似我身全。试观竿上抛生体，且拟波中戏钓船。名利不求还独乐，是非莫辩只高眠，何当对景幽堂坐，更得闲吟度百年。”他分司西京十余载，与司马光、文彦博、富弼等为“真率会”，评击新政，当时号为“洛阳九老”。

①《宋史》卷三三一。

②《宋史》卷三二九。

③《长编》卷四五三。

④《郾溪集读补》页一。